

《特稿》

永遠的「笳吹弦誦」

——關於西南聯大的歷史、追憶及闡釋*

陳平原

「七七」事變爆發，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2月西遷入滇，4月抵昆明後，更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1946年7月31日聯大結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據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稱：「9年之中，先後在聯大執教的教授290餘人，副教授48人。前後在校學生約8000人，畢業生有3800人。」¹日後，這些教授與學生中英才輩出，這所大學因而永垂不朽。

借助於報紙公告、電臺廣播、私人通信等，獲得資訊的三校學生紛紛歷盡艱險，趕往長沙報到。1937年11月1日，學校正式上課。上午9點，響起了空襲警報，師生並未逃避，校史上加了個括弧「實在也無處可躲」。²作者的本意是，當時尚未來得及挖防空洞；我則理解為，已經沒有退路了，故師生們置生死於度外，大義凜然地走進教室。此舉頗具象徵意義，就在這連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開……「萬里長征，辭卻了五史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別離，絕檄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春城，情彌切。」³

* 陳平原現職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¹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xue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Guoli xinan lianhexuexue xiaoshi(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daxue chubanshe], 1996年), 頁2。

² 同上註，頁21-22。

³ 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da Beijing xiaoyouhui 刊行紀念文集《笳吹弦誦在春

一、戰火摧不垮的中國大學

八年抗戰，中國大學不僅沒被戰火摧毀，還發展壯大，這實在是個奇跡。據史家稱，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員7560人，職員4290人，學生41992人；1945年，抗戰勝利時，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員11183人，職員7257人，學生83498人。⁴具體到某著名大學，情況尤其明顯。比如，浙江大學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復員返杭時，教授、副教授達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⁵中央大學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師290人；到抗戰結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師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⁶唯獨聲名最為顯赫的西南聯大，因系三校合一，發展規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樣以1944年度為例，西南聯大各類學生加起來，不過2058名，至於教職員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數量上遠不及中央大學。⁷也就是說，作為整體的西南聯大，其辦學規模約略等於中央大學的三分之二。考慮到中央大學和西南聯大均為國立大學，其經費來源一樣，單看這兩組數字，便

城》*Jiachuixiansong zai chuncheng*（1986年）、《笳吹弦誦情彌切》*Jiachu xiansong qingmiqie*（1988年），都是借用此羅庸 Luo Yong 詞、張清常 Zhang Qingchang 曲：〈西南聯合大學校歌〉“*Xinan lianhedaxue xiaoge*”。

⁴ 曲士培 Qu Shiwei：《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Zhongguo daxue jiaoyu fazhanshi*（太原[Taiyuan]：山西教育出版社[Shanxi jiaoyu chubanshe]，1993年），頁522-523、頁530-531。

⁵ 顧建民 Gu Jianmin 等：〈浙大西遷——抗戰期間中國高校西遷的縮影〉“*Zhedaxiqian — kangzhanqijian zhongguogaoxiao xiqian de suoying*”，載李曙白 Li Shubai 等編著《西遷浙大》*Xiqian zheda*（杭州[Hangzhou]：浙江大學出版社[Zhejiang daxue chubanshe]，2007年），頁238。

⁶ 龔放 Gong Fang 等編著：《南京大學》*Nanjingdaxue*（長沙[Changsha]：湖南教育出版社[Hunan jiaoyu chubanshe]，1995年），頁66-67。

⁷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歷年在校學生人數統計表〉“*Guoli xinan lianhedaxue linian zaixiaoxuesheng renshu tongjibiao*”、〈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十三年度教員名冊〉“*Guoli xinan lianhedaxue sanshisanniandu jiaoyuanmingce*”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十三年度教授、副教授名單〉“*Guoli xinan lianhedaxue sanshisa niandu jiaoshou, fujiashou mingchan*”，見北京大學 Beijingdaxia 等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Guoli xinan lianhedaxue shiliao*（昆明[Kunming]：雲南教育出版社[Yunnan jiao yu chubanshe]，1998年），第5冊頁3-4，第4冊頁156-176，頁326-328。

能明白國民政府的態度。⁸對於大學來說，規模不等於水準，更不等於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的高等教育沒有被戰火摧毀，反而越戰越強，這點很讓人欣慰。

在大部分國土相繼淪陷的狀態下，為了保存「讀書種子」，也為日後建國大業儲備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國大學，在國民政府的統籌下，紛紛內遷。最早關注這一重大現象並作出詳細調查的，是 1941 年 10 月 25 日《解放日報》所刊《抗戰後專科以上學校集中區域》：

成都（川西）區（學生約 6500 人）：武漢大學、四川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大學醫學院、中央技藝專校、西康技藝專校（以上國立）、金陵大學、金陵女院、朝陽學院、光華大學、齊魯大學、華西大學（以上私立）；重慶（川東）區（學生約 7000 人）：中央大學、女子師範學院、藥學專校（以上國立）、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以上省立）、復旦大學（籌改國立）、私立中華大學等；昆明（雲南）區（學生約 4500 人）：西南聯大、同濟大學、雲南大學、中正醫學院、藝術專校、國術體育專校等（均國立）；貴陽（貴州）區（學生約 4000 人）：浙江大學、唐山工程學院、貴陽醫學院、（以上國立）湘雅醫學院、大夏大學（私立）等；西北區（學生約 5000 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北農學院、西北醫學院、西北師範學院、西北技藝專校（以上國立）、山西大學（省立）等；兩廣區（學生約 4000 人）：中山大學、廣西大學（以上國立）、江蘇教育學院、廣東文理學院（以上省立）、華中大學、國民大學、廣州大學、勤勤學院（以上私立）等；湘西區（學生約 1100 人）：湖南大學、師範學院、商業專校（以上國立）、民國學院（私立）；上海區（學生約 7400 人，注：偽校不在內）：交通大學、暨南大學、上海醫

⁸ 在〈首都的遷徙與大學的命運——民國年間的北京大學與中央大學〉“Shoudou de qianxi yu daxue de mingyun——minguo nianjian de beijingdaxue yu zhongyangdaxue”，《文史知識》Wenshi zhishi 第 5 期（2002 年）中，我曾提及：「西南聯大在現代中國教育史上名聲顯赫，至今仍『笳吹弦誦情彌切』，但很少有人追究這一光榮背後的陰影。不管國民政府是否有意，將北方三大名校合成一『名師薈萃』的西南聯大，其實是矮化北大而拔高中大。」

學院、上海商學院（以上國立）、滬江大學、光華大學（分校）、震旦大學、東吳大學、大同大學、上海法政、上海美專、南通學院等，以及抗戰後新成立之太炎文學院、達仁學院、新中國大學等十餘校（均私立）；北平區（學生約 2500 人，注：偽校不在內）：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協和醫學院、鐵路專校（以上私立）、中法大學（中法合辦）。其他地區（學生約 3000 人）：如分散在福建之國立廈門大學、私立協和學院、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浙江之國立英士大學、省立醫專；江西之國立中正大學、蘇皖政治學院；河南之省立河南大學等。

附注：一、各地區主要專科以上學校均已列入。有「等」字者即尚有少數未列入。

二、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不在內。⁹

這一統計，包含了遷入租界的若干國立及私立大學，但排除了日本人控制的「偽校」（如「偽北京大學」、「偽中央大學」）。1941 年 12 月 7 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辦（協和醫學院、滬江大學）或內遷（燕京大學遷成都、交通大學遷重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南地區文史資料協作會議編《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其中收錄〈抗日戰爭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情況一覽表〉，記載抗戰期間遷往西南的高校 56 所，未見上表的有 36 所。因統計時間不同，有統計時已遷走的（如國立中山大學），也有統計時尚未遷入的（如國立交通大學）；但除掉這些，還是有不少重要的遺漏，如 1937 年由青島遷四川萬縣的山東大學、1938 年由青島遷四川萬縣的山東醫學專科學校、1939 年由南京遷四川江安的國立戲劇專科學校、1939 年由上海遷重慶的國立音樂學院、1938 年由南京遷重慶的國立中央工業專科學校等。¹⁰最近十幾年，隨著學界對於抗戰中大學內遷的研究日益精細，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¹¹

⁹ 〈抗戰後專科以上學校集中區域〉“Kangzhanhou zhuanke yishang xuexiao jizhong quyue”，《解放日報》Jiefang ribao 第 3 版，1941 年 10 月 25 日，原為表格，分作「區域」、「學校」、「學生數」3 欄。

¹⁰ 〈抗日戰爭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情況一覽表〉“Kangri zhanzheng shiqi neiqian xinan de gaodengyuanxiao qingkuang yilanbiao”，《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

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一種民族精神及抗戰的堅強意志。而絕大多數大學的遷徙過程，並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而是迫於戰火臨近，不得不再搬遷。像西南聯大那樣暫住長沙，而後遷往昆明，已經算是很幸運的了。創建於 1907 的國立同濟大學，校址原在上海吳淞鎮北，抗戰八年間，輾轉內遷六次：一遷上海市區，二遷浙江金華，三遷江西贛州，四遷廣西八步，五遷雲南昆明，六遷四川李莊。¹²而國立浙江大學同樣歷盡艱辛——「經過四次大的搬遷，行程 2600 餘公里，足跡遍及浙、贛、湘、桂、閩、粵、黔七省，於 1940 年 1 月到達黔北，在遵義、湄潭、永興等地堅持辦學，直至抗戰勝利，於 1946 年 5 月返回杭州。」¹³大學內遷的特點在於，不是簡單的逃難，而是在戰火中堅持教學與科研。如浙大三遷廣西宜山，「宜山縣城，雖不甚大，而街市整潔，浙大校舍，以文廟標營為中心，又在標營，新建草棚，作臨時教室，師生於此，安心教學者，計一年又兩閱月之久。」¹⁴「1939 年 2 月 5 日，敵人派 18 架飛機，來浙大上空，轟炸三次，標營校舍，計投下爆炸燃燒彈 121 枚。」¹⁴即便如此，浙

Kangzhanshiqi neiqianxinan de gaodengyuanxiao (貴陽[Guiyang]: 貴州民族出版社 [Guizhouminzu chubanshe], 1988 年), 頁 352-356。

¹¹ 余子俠 Yu Zixia:〈抗戰時期高校內遷及其歷史意義〉“Kangzhan shiqi gaoxiao neiqian ji ji lishiyiyi”,《近代史研究》*Jindaishi yanjiu* 第 6 期(1995 年)、徐國利 Xu Guoli:〈關於抗戰時期高校內遷的幾個問題〉“Guanyu kangzhan shiqi gaoxiao neiqian de jige wenti”,《抗日戰爭研究》*Kangri zhazheng yanjiu* 第 2 期(1998 年)、夏紹先 Xia Shaoxian:〈抗戰時期雲南的教育——內遷院校與雲南教育的發展〉“Kangzhanshiqi yunnan de jiaoyu——neiqian yuanxiao yu yunnan jiaoyu de fazhan”,《雲南師範大學學報》*Yunnan shifandaxue xiaobao* 第 6 期(2002 年)、張成明 Zhang Chengming 與張國鏞 Zhang Guoyong:〈抗戰時期遷渝高等院校的考證〉“Kangzhan shiqi qian yu gaodengyuanxiao de kaozheng”,《抗日戰爭研究》*Kangri zhazheng yanjiu* 第 1 期(2005 年)、胡瑛 Hu Ying:〈抗戰時期的高校內遷及其意義〉“Kangzhan shiqi de gaixiao neiqian ji ji yiyi”,《文史雜誌》*Wenshi zazhi* 第 4 期(2005 年)。

¹² 李法天 Li Fatian、李奇謨 Li Qimo:〈抗戰期間同濟大學內遷回憶片斷〉“Kangzhan qijian tongjidaxue neiqian huiyi pianduan”,《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Kangzhan shiqi neiqian xinan de gaodengyuanxiao*(貴陽[Guiyang]: 貴州民族出版社 [Guizhouminzu chubanshe], 1988 年), 頁 71-77。

¹³ 李曙白 Li Shubai 等:〈西遷浙大序〉“Xiqian zheda xu”,載《西遷浙大》*Xiqian zheda*。另《國立浙江大學》*Guoli zhejiangdaxue* (臺北[Taipei]: 國立浙江大學校友會 [Guoli zhejiangdaxue xiaoyohui], 1985 年), 第四輯「西遷紀實」, 收文 27 篇, 載頁 385-545。

¹⁴ 祝文白 Zhu Wenbai:〈抗日期間的浙江大學〉“Kangri qijian de zhejiangdaxue”,《抗

大師生依舊堅持，一直到 1939 年南寧失守，宜山告急，才迫不得已北遷。在遵義、湄潭等地辦學的浙大，據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憶：「雖然條件艱苦，生活清貧，但我們朝氣蓬勃，精神愉快，學術風氣很濃，有『東方劍橋』的雅稱。同事之間，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團結友愛，親密無間，平等相待。」¹⁵正因此，浙大人對於貴州心存感激，南歸之前，專門以校長竺可楨名義立碑紀念。¹⁶

當然，抗戰中內遷大學之立碑紀念，最著名的，還屬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具體談論的是西南聯大，但碑文所表達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歸的歡欣與讚歎，¹⁷屬於全體內遷高校的師生。

中國大學如此大規模內遷，且堅持到最後勝利，這確實是個奇蹟。二戰中其他國家的大學，也都面臨各種危機，但惟一差可比擬的，是前蘇聯的諸多學校。康斯坦丁諾夫等編《蘇聯教育史》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衛國戰爭形勢，不能不影響到國民教育和蘇維埃學校活動。成千上萬高年級學生、教師和大學生，滿懷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離校參加了民兵、紅軍和遊擊隊。」¹⁸為了保護兒童，政府將靠近前線的幼

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Kangzhan shiqi neiqian xinan de gaodengyuanxiao，頁 118-123。

¹⁵ 王淦昌 Wang Ganchang：〈難於忘懷的五年〉“Nanyu wanghuai de wunian”，《浙江大學在遵義》Zhejiangdaxue zai zunyi（杭州[Hangzhou]：浙江大學出版社[Zhejiangdaxue chubanshe]，1990年），頁 155-156。

¹⁶ 竺可楨 Zhu Kezhen：〈國立浙江大學黔省校舍記〉“Guoli zhejiangdaxue qiansheng xiaosheji”：「軍興以來，初徙建德，再徙泰和，三遷宜山，而留貴州最久，不可以毋記也；故記之以諗後之人。」，見《浙江大學在遵義》Zhejiangdaxue zai zunyi，頁 797。

¹⁷ 馮友蘭 Feng Youlan，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xda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Guoli xinan lianhexdaxue jinianbeiwen”：「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見《笳吹弦誦情彌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Jiachuixiansong qingmiqie——guoli xinan lianhexdaxue wushizhounian jinian wenji（北京[Beijinh]：中國文史出版社[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1988年），頁 2。

¹⁸〔俄〕康斯坦丁諾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Новосёлов）等編、吳式穎 Wu Shiyong 等譯：《蘇聯教育史》Sulian jiaoyushi（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1996年），頁 490。

稚園和小學撤退到後方；至於學校課堂「講授的內容具有更大的實用性」
 「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聯繫，並設立了戰時防禦题目的講授。」¹⁹毫無疑問，高等院校與衛國戰爭的關係更為密切：「為了搶救高等學校的物質、文化財富，高等學校的全體師生員工進行了奮不顧身的鬥爭，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學實驗設備、圖書館、珍貴陳列品，撤退到國家的後方。」而斯大林格勒戰役獲勝後的第八天，一批蘇聯大學教授來到這個被徹底破壞的城市，重建醫學院，第二年便恢復了正常的教學工作。²⁰蘇聯衛國戰爭中，與西南聯大的遭遇最為接近的，莫過於莫斯科大學。「就在1941年6月22日戰爭爆發的當天下午，（莫斯科大學）就有數百名教師、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職工投筆從戎，參加了保衛祖國的鬥爭。」不久，又有物理系教授、歷史系教授等師生數百人上前線。整個戰爭期間有三千多人參加蘇聯紅軍，許多人犧牲在戰場。而留在學校裡的專家，則「徹底修訂了科研工作計畫，把一些有關和平建設的課題取消了，而把具有國防意義的課題放在首位。」²¹具體的遷徙行程是：1941年10月開始，大部分師生遷到土庫曼共和國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復課；1942年夏季，戰局不利，又遷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隨著蘇軍由戰略防禦轉向戰略進攻，1943年春，莫大勝利回遷莫斯科。²²換句話說，莫斯科大學漂流在外的時間不到一年半。

英國的大學雖被轟炸，但未被佔領；法國全境被佔領，大學因而無處可遷；唯有前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但因時間不長，沒能像西南聯大那樣，不但未被戰火摧毀，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催生出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

有一點值得注意，基於對長期抗戰的預期、對學問的敬重，以及對中國國情的瞭解，國民政府並沒像一戰中的英美或二戰中的蘇聯那樣，徵召大批的大學生（更不要說教授）入伍。在這個問題上，教育部及大學校長們有更為長遠的考慮。面對各方激烈爭議，教育部不為所動，認定：「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

¹⁹ 同上註，頁490；492。

²⁰ 葉留金著、張天恩 Zhang Tianen 等譯：《蘇聯高等學校》*Sulian gaodeng xuexiao*（北京[Beijing]：教育科學出版社[Jiaoyukexue chubanshe]，1983年），頁52-54。

²¹ 衛道治 Wei Daozhi 編著：《莫斯科大學》*Mosike daxue*（長沙[Changsha]：湖南教育出版社[Hunan jiaoyu chubanshe]，1995年），頁35-38。

²² 同上註，頁36-37。

學，本不甚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徵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²³至於浙大校長竺可楨，也在〈大學生與抗戰建國〉中表達了類似的見解：「第一次大戰時，英美各國都送大量的大學生上前線去是一個失策，到了戰後才深深地感覺到」；「國家為了愛護將來的領袖人物起見，不把大學生送往前線去衝鋒殺敵，則他們應如何奮身圖報，努力上進，能把將來建國的重任擔當起來，方可對得起戰死沙場的勇士們，方不愧為今日之程嬰。」²⁴當局表彰熱血青年投筆從戎，但不做硬性規定，這也是抗戰中教授及大學生犧牲較少的緣故。西南聯大紀念碑的碑陰刻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參軍人數 834 人，犧牲 5 人。實際上，還有若干沒來得及匯入此題名的，²⁵但總的來說，並非絕大犧牲。

二、「光榮」不僅屬於西南聯大

抗日戰爭中，於顛簸流離中弦歌不輟的，不僅是西南聯大。可後人談論「大學精神」，或者抗戰中的學術文化建設，都會以西南聯大為例證。作為史家，我承認此例證很有說服力；但同時我更想強調，還有很多同樣可歌可泣的「大學故事」。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涵著某種讓後人肅然起敬的精神。

²³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Dierci zhongguojiaoyu nianjian*（上海[Shanghai]：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1948 年），第一編「總述」，第二章「抗戰時期教育」，總第 10 頁。

²⁴ 竺可楨 Zhu Kezhen：〈大學生與抗戰建國〉“Daxuesheng yu kangzhanjianguo”，初刊《國立浙江大學校刊》*Guoli zhejiangda xue xiaokan* 復刊 100 期特大號及《星期評論》*Xingqi pinglun* 39 期（1941 年 10 月 24 日），見《竺可楨全集》*Zhu k zhen quanji*（上海[Shanghai]：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Shanghai keji jiaoyu chubanshe]，2004 年），第 2 卷，頁 551-552。

²⁵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Guoli xinan lianhexue xiaoshi*（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daxue chubanshe]，1996 年）第 1 編第 10 節「三次從軍熱潮」，頁 75-82、聞黎明 Wen Liming：《抗日戰爭與中國知識份子》*Kangri zhanzheng yu zhongguo zhishifenzi*（北京[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Shehuikexuewenxian chubanshe]，2009 年），第 7 章第 5 節「青山處處埋忠骨」，頁 330-336。

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南方日報》刊文為中山大學「抱屈」：「前後7年，顛沛流離，幾度遷徙，三易校址。先遷雲南，復遷粵北，三遷粵東仁化、連縣。抗戰八年，不少中國人記住了西南聯大，殊不知在廣東的國立中山大學，師生們在國難面前也經歷著民族個人的深重磨難，在流離中堅持學術理想，在動盪裡堅持抗日救亡，在歷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滿精神的一筆。」²⁶是的，「在流離中堅持學術理想，在動盪裡堅持抗日救亡」的，不僅僅是中山大學，也不僅僅是西南聯大。我要追問的是：為何聯大的故事廣為傳播，且更深入人心，乃至成了「中國大學」理所當然的「代表」。

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一，學術實力超強，這當然是最為重要的原因。可除此之外，還牽涉到一些別的問題，比如「故事」的傳播與更生。就以「湘黔滇旅行團」為例，校歌裡提到的「萬里長征」，由北京、天津而暫住長沙，這一段不稀奇；第二年轉赴蒙自、昆明，三路人馬中，湘黔滇旅行團獨領風騷。約三百名師生組成的旅行團，3500里長途跋涉，歷時68天的「小長征」，無論當時還是日後，都一再被提及，且作為聯大精神的象徵。

正如胡適在紀念聯大九周年集會上說的：「這段光榮的歷史，不但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²⁷可其他大學也有類似的舉措，為何長期湮沒無聞？1938年7月，同濟大學第四次內遷到廣西賀縣八步鎮：「這次遷校，從贛州到桂林一段，大多數同學組織了赴桂步行隊，每隊十一二人，堅持每天走五六十里路，充分體現了同濟大學同學吃苦耐勞、共渡時艱的奮鬥精神。到桂林後，沿灘江乘木船經陽朔至平樂，轉程至八步，前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²⁸1938年9月，浙

²⁶ 〈八年抗戰·〈思鄉曲〉伴隨中大流離歲月〉“Banian kangzhan·‘sixiangqu’ bansui zhongda liuli de suiyue”，《南方日報》*Nanfang ribao*，2005年8月15日。

²⁷ 〈梅貽琦、黃子堅、胡適在聯大校慶九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摘要〉“Mei Yiqi, Huang Zijian, Hu Shi zai lianda xiaoqing jiuzhounian jinianhui shang de jianghua zhaiyao”，原載北平《益世報》*Yishi bao*，1946年11月2日，見西南聯大校友會 *Xinan lianda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Jiachuixiansong zai chuncheng*——*huiyi xinan lianda*（雲南[Yunnan]：雲南人民出版社[Yunnan renmin chubanshe]／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daxue chubanshe]，1986年），頁514。

²⁸ 李法天 Li Fatian、李奇謨 Li Jimo：〈抗戰期間同濟大學內遷回憶片斷〉“Kangzhan qijian tongjidaxue neiqian huiyi pianduan”，《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Kangzhan shiqi neiqian xinan de gaodengyuanxiao*（貴陽[Gui yang]：貴州民族出版社[Guizhouminzu

江大學從江西泰和轉往廣西宜山，「學生方面，為鍛煉體質，沿途採訪計，另有步行團之組織，計分兩隊，共有陶光業……等二十人。以九月十九日出發，校長當贈以地圖表格等件，以示鼓勵。」這次「經行千里，費時四十餘日。」²⁹1939年初，中山大學輾轉撤往雲南澄江，據說有幾百學生「分別結隊從連江西行，長途跋涉，徒步赴滇，歷經粵、湘、桂、黔、滇5省，最後趕到澄江復課。」³⁰1939年5月，河南大學師生員工「在王廣慶校長的率領下，徒步北越伏牛山，經方城、葉縣、寶豐、臨汝、伊陽、伊川，行程六百餘里，終於抵達嵩縣縣城。」³¹為何其他大學的「步行隊」聲名遠不及湘黔滇旅行團？作為「事件」，中大校史的說法相當含糊，³²同濟則是半個世紀後的個人追憶，浙大有二十人名單，屬於記錄在案，可也就是這麼兩句話，³³那比得上西南聯大校友的連篇累牘、聲情並茂？

湘黔滇旅行團指定了丁則良等三人為日記參謀，全面記錄旅行團活動，寫成了約二十萬字的日記，寄到香港交商務印書館刊行，只是因太

chubanshe], 1988年), 頁74。

²⁹ 李絮非 Li Jiefei: 〈浙江大學西遷紀實〉“Zhejiangdaxue xiqian jishi”, 《國立浙江大學》Guoli zhejiangdaxue 上冊, 頁407。

³⁰ 黃義祥 Huang Yixiang 編著:《中山大學史稿(1924-1949)》Zhongshandaxue shigao (1924-1949)(廣州[Guangzhou]:中山大學出版社[zhongshandaxue chubanshe], 1999年), 頁320。另, 當年激江中學校長解德厚 Jie Dehou 日後撰:〈抗戰時期中山大學遷激江始末〉“Kangzhan shiqi zhongshandaxue qian zhengjiang shimo”, 見《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Kangzhan shiqi neiqian xinan de gaodengyuanxiao, 頁83-86。也只是大致勾勒中大師生奔赴激江的幾條路線, 稱其「千里跋涉, 一路上忍饑挨餓, 備受艱辛」, 沒有更多細節描寫。

³¹ 河南大學校史編寫組 Henandaxue xiaoshibianxiezu:《河南大學校史》Henandaxue xiaoshi (開封[Kaifeng]:河南大學出版社[Henandaxue chubanshe], 2002年), 頁84。1944年5月, 日軍奔襲潭頭鎮, 河大遭遇巨大損失, 師生被殺16名、失蹤25名, 逃離虎口者輾轉攀援於崇山峻嶺之間, 歷時月餘, 陸續到達浙川縣荊紫關。第二年又被迫西遷, 師生及眷屬「經商南, 越秦嶺, 過藍田, 步行800里, 於4月中旬抵達西安」。同上書, 頁176-178。

³² 臺灣中大校友會 Taiwan zhongda xiaoyouhui 編印:《國立中山大學的回顧與展望》Guoli zhongshandaxue de huigu yu zhanwang (高雄[Gaoxiong]:臺灣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會[Taiwan guoli zhongshandaxue xiaoyouhui], 1986年)中, 陳蘭皋、謝順暢等文涉及中大在激江, 但沒有赴滇旅途的真切描述。

³³ 李絮非 Li Jiefei:〈浙江大學西遷紀實〉“Zhejiangdaxue xiqian jishi” 1939年在廣西宜山刊印, 半個世紀後收入浙大校友會編印的《國立浙江大學》Guoli zhejiangdaxue 上冊, 頁385-421。

平洋戰爭爆發而不幸失落。³⁴即便如此，也有諸多書寫刊行，如外文系三年級學生林振述（林蒲）的《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記》（1938年春發表於《大公報》副刊《小公園》）、中文系二年級學生向長清的《橫過湘黔滇的旅行》（1938年10月發表於巴金主編的《烽火》）、政治系二年級學生錢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商務印書館，1939年），以及生物系助教吳征鎰的《長征日記——由長沙到昆明》（《聯大八年》，1946年）。³⁵上世紀80年代以後，有心人士積極整理資料，徵集照片，引導校友追憶往事，加上中外學者的介入，湘黔滇旅行團的故事因而相當完整。讀張寄謙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合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你很容易明白，為什麼同濟大學「赴桂步行隊」等會失落在歷史深處。

同樣是長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團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除了旅程長，還因為旅行團中有教授聞一多、李繼桐、曾昭掄、袁復禮等。張寄謙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合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的序言中，除概述湘黔滇旅行團的組織及行程，還提及此旅行團如何「出人才」——截止此書刊行的1999年，旅行團成員中日後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有屠守鍔、唐敖慶等十一人，被評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有陳力為等三人；至於著名人文學者，除了序言列舉的任繼愈、馬學良、王玉哲、劉兆吉、唐雲壽等，作為後學，我還可以舉出查良錚（穆旦）、季鎮淮、何善周、丁則良、孫昌熙等。這也是此旅行團格外吸引人的地方——如此藏龍臥虎，確實了不起。

此次「小長征」，影響了這三百旅行團成員，也影響了這所大學的性格。確實如美國學者易社強（John Isrnel）所說，經由一遍遍的言說

³⁴ 張寄謙 Zhang Jiqian 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合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 *Zhongguo jiaoyushishang de yi ci chuanguju——xinan lianhexuexue xiangqiandian luhanguan jishi*（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daxue chubanshe]，1999年）的〈序〉。

³⁵ 吳、林二作見西南聯大校友會 Xinan lianhexuexue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 *Jiachuixiansong zai chuncheng——huiyi xinanlian da*，頁1-24，後者附有原作者的〈橫過湘黔滇的旅行後記〉“Hengguo xiang qian dian de luxing houji”；上述4作均收入張寄謙 Zhang Jiqian 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合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 *Zhongguo jiaoyushishang de yici chuanguju——xinan lianhexuexue xiangqiandian lu:hangtuanjishi*，見頁122-196；頁343-352。

與書寫，「長征的現實夾雜著神話和傳奇的色彩」。³⁶「這次長征是一次艱苦卓絕的跋涉之旅，此後是八年患難，它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群體才能的象徵；因此，也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續不輟的象徵。」³⁷

一個事件或人物，能否被後人追懷不已，除了自身的歷史價值，還與有無動人的細節相關。中央大學瀕臨長江，內遷重慶最為順暢，也最為便捷，本沒什麼好說的。可校長羅家倫很會講故事，抓住一個細節，讓你永志不忘。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學大部已搬遷，羅家倫到南京三牌樓農學院實習農場和職工道別。校長走後，農場職工認為畜牧場的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鵝、北京鴨等都是飼養多年的良種家畜，決定把這些家畜家禽搬遷到大後方去，於是推舉王西亭為負責人，經過千辛萬苦，歷時一年，於1938年11月中旬到達重慶。羅家倫1941年「於重慶警報聲中」撰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稱：「我於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牠們到了，彷彿如亂後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³⁸這故事實在太動人了，以至於日後講述抗戰中的大學內遷，很難遺漏中央大學。

聯大師生的湘黔滇旅行團，也是因為有大量的細節，才顯得如此豐滿，且神采奕奕。旅行團從一開始就注意搜集資料，專人記錄日記，沿途採風問俗，順便做社會調查及文化考察，甚至還留下了《西南三千五百里》（錢能欣）、《西南采風錄》（劉兆吉編）這樣的作品。此外，像抄錄玉屏縣縣長劉開彝具名的佈告³⁹，沿途拍攝各種照片⁴⁰，以及圍繞聞

³⁶ 張寄謙 Zhang Jiqian 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合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Zhongguo jiaoyushishang de yi cichuangju——xinan lianhexue xiangqiandian lu:hangtuanjishi*，頁497-542，收錄易社強 John Isrnel 著、何田 He Tian 譯〈從長沙到昆明：西南聯大的長征是歷史也是神話〉“Cong changsha dao kunming——xinanlianda de changzheng shi lishi yeshi shenhua”。此文後經作者改寫，成為《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第一部分「愛國者的長途跋涉」之第二節「聯大的長征」。

³⁷ 易社強 John Isrnel 著、饒佳榮 Rao Jiarong 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Zhanzheng yu geming zhong de xinanlianda*（臺北[Taipei]：傳記文學出版社[Chuanjiwenxue chubanshe]，2010年），64頁。

³⁸ 羅家倫 Luo Jialun：〈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Zhadanxia changda de zhongyangdaxue”，《逝者如斯集》*Shizherusiji*（臺北[Taipei]：傳記文學出版社[Chuanjiwenxue chubanshe]，1967年），頁28-29。

³⁹ 玉屏縣政府佈告：「查臨時大學近由長沙遷昆明，各大學生徒步前往。今日（十六）可抵本縣住宿，本縣無寬大旅店，茲指定城廂內外商民住宅，概為各大學生住宿之

一多教授的一系列故事，所有這些，都是湘黔滇旅行團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原因。

三、必勝信念、學術關懷以及師生情誼

談及西南聯大對於抗日戰爭的貢獻，容易說的，是有形的，如培養人才、推動科研以及投身戰場；不太好說的，是無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何凸顯某種高貴的精神氣質。具體說來，硝煙彌漫中，眾多大學師生弦歌不輟，這本身就是一種穩定人心的力量。當初聯大教授曾昭掄撰〈大時代在等著青年們〉，稱：「古今中外一切戰爭，凡一交戰國家，充滿失敗主義者，大敗即不在遠。難民比敵人跑得快，謠言比難民跑得更快，這是何等危險的現象。」從最初的殊死抵抗，到漫長的相持階段，再到最後的戰略反攻，有很長的路要走。用曾昭掄的話來說，就是：「環觀國際形勢，同盟國家必獲最後勝利，誠屬必然之事。日寇何時得以完全擊潰，則尚無把握。」⁴¹因此，西南聯大以及眾多撤退到大後方的中國大學，無論如何顛沛流離，堅持「笳吹弦誦」，這本身便是抗戰必勝信念的最好體現。

著名數學家陳省身晚年接受採訪，談及西南聯大師生「堅持抗戰的決心」，「精神上，覺得中國可以站起來。」⁴²堅信中國不會亡、中國人能夠站起來，正是這種民族自信，支撐著西南聯大以及無數內遷大學的師生。今天看來是很自然的事，當初卻困擾不少讀書人——正因為瞭解中日兩國經濟及軍事實力，不太相信中國能獲勝（周作人的北平「苦住」

所。凡縣內商民際此國難嚴重，對此振興民族領導者——各大學生，務須愛護借重，將房屋騰讓，打掃清潔，歡迎入內暫住，並予以種種之便利。特此佈告，仰望商民一體遵照為要。此布。」見張寄謙 Zhang Jiqian〈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序〉“Zhongguo jiaoyushishang de yici chuangu . xu”。

⁴⁰ 張寄謙 Zhang Jiqian 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Zhongguo jiaoyushishang de yici chuangu* 徵集歷史照片，印在書中的就有 102 頁；在相機極為罕見的時代，能有如此豐富的遺存，實在難得。

⁴¹ 曾昭掄 Ceng zhao lun：〈大時代在等著青年們〉“Dashidai zai dengzhao qingnianmen”，原刊《民主週刊》*Minzhu zhoukan* 1 卷 3 期（1944 年）；見《一代宗師——曾昭掄百年誕辰紀念文集》*Yidai zongshi——Zeng Zhaolun bainiandanchen jinian wenj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daxue chubanshe]，1999 年），頁 44-47。

⁴² 張曼菱 Zhang Manling 總編導：《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Xinliananda renwu fangtanlu*（昆明 [Kunming]：雲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jiaoyu chubanshe]，2007 年），頁 29、頁 36。

乃至「落水」，根本原因在此)。在我看來，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的歷史貢獻，精神感召是第一位的。在大後方是穩定民心，而對於淪陷區民眾，則是民族復興的希望所在。因此，穿越封鎖線，奔赴大後方任教或求學，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選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兵開進了燕京大學，不願做亡國奴的燕大學生林燾等一行六人，決心投奔自由，從北平輾轉來到成都燕京大學復學。據林燾日後追憶，中間諸多艱險，「一般同學從北平到成都只需要二十來天，我們竟走了兩個多月。」⁴³而中文系教授浦江清為踐西南聯大之約，1942年5月29日從上海出發，歷千辛萬苦，經蘇、皖、贛、閩、粵、桂、貴、雲八省，來到昆明任教，讀其《西行日記》，讓人感慨萬千。1942年11月21日，星期六，浦江清終於到達昆明，那天的日記是：「自五月二十九日離滬，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歷艱難有非始料所及者。」⁴⁴

瞭解這些，你才能理解，為何前西南聯大經濟學系教授、系主任陳岱孫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撰寫序言，會特別表彰聯大師生「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信念永不動搖」，以及「對國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在他看來，正是這兩點，「曾啟發和支撐了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們對敬業、求知的追求，」而「這精神在任何時代都是可貴的，是特別值得紀念的。」⁴⁵我曾在一次專題演講中提及：「聯大有什麼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志向。聯大人貧困，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這是我閱讀西南聯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⁴⁶

⁴³ 林燾 Lin Tao：〈浮生散憶〉“Fusheng sanyi”，見《燕園遠去的笛聲——林燾先生紀念文集》*Yanyuan yuanqu de disheng——LinTao xiansheng jinian wenji*（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2007年），頁479。

⁴⁴ 浦江清 Pu Jiangqing：《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Qinghuayuan riji——x xing riji*（北京[Beijing]：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1987年），頁97-198。

⁴⁵ 陳岱孫 Chen Daisun：〈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序〉“Guoli xinan lianhedaxue xiaoshi xu”，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da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Guoli xinan lianhedaxue xiaoshi*。

⁴⁶ 〈尋找21世紀中國的「大學之道」〉“Xinzhao 21 Shiji zhongguo de ‘Da Xue Zhi Dao’”，《錢江晚報》*Qianjiang wanbao* 第14、15版，2007年12月18日，收入陳平原 Chen Pingyuan《大學有精神》*Daxue you jingshen*（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

當國家處在危急關頭，各大學的教授及學生如何盡到一個國民的責任、為抗戰做貢獻？這不僅是個人選擇，還牽涉到大後方諸多大學的辦學方向，以及無數師生的教學和日常生活。教育部的基本方針是「戰時須作平時看」，課程設置略為調整，以適應戰爭需要，「但一切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其主旨」。⁴⁷1939年3月4日，蔣介石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講話，進一步明確戰時教育的大政方針：「總而言之，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就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爭，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當看到戰後。」⁴⁸

國民政府的這一重大決策，得到大學校長及教授們的支持。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寫於1941年6月的《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稱：

當我們初來的時候，學生受外間不成熟輿論的影響，常有要求改變課程，受所謂戰時教育的聲浪。那時候他們心目中以為有一種短期速成的教育，像「萬應靈丹」一樣，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懇切的告訴他們，說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學教育裡面，絕無「王者之路」（捷徑），何況大家不是王者。學問是謹嚴的，是有步驟的。一種學問學好了，平時可用，戰時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們能不能「一隅三反」。戰時教育，只須把平時教育加緊，更須加重軍事體育的訓練，加強國家民族的意識，就可以了。⁴⁹

即便是思想激進的聯大中文系教授聞一多，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也談及，當校園裡爭執如何實行「戰時教育」時：「教授大都與政府的看法相同：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研究，以待將來建國之用，何況學生受了

版社[Beijingdaxue chubanshe]，2009年）時，改回原題〈教育史上的奇跡——西南聯大的意義“Jiaoyushishang de qiji——xinan lianda de yiyi”〉。

⁴⁷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Dierci zhongguo jiaoyu nianjian* 第一編「總述」，第二章「抗戰時期教育」，總第10頁。

⁴⁸ 蔣介石 Jiang Jieshi：〈第三屆全國教育會議開會訓詞〉“Disanjie quanguo jiaoyu huiyi kaihuixunci”，《抗戰建國論》*Kang zhan jianguolun*（出版地不詳：現代文化出版社[Xiandaiwenhua chubanshe]，1939年），頁92。

⁴⁹ 羅家倫 Luo Jialun：〈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Zhadanxia changda de zhongyangdaxue”，《逝者如斯集》*Shizherusiji*，頁34-35。

訓，不見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為那時的中國軍隊確乎打的不壞。」⁵⁰基於中國人對「知識」的渴求以及對「學問」的敬重，國民政府一方面調整總體佈局，在協助眾多沿海教育機關遷往西南的同時，特意搬遷了一些學校到西北（設立西北聯大、西北農學院、西北工學院等），另一方面，大量擴充理、工、農、醫等院校（科系），以適應戰爭對國防建設及科技人才的特殊需要。教育部之指令各高校開設若干配合抗戰的課程，但堅持不降低教育水準，拒絕將大學改造成應急的培訓學校，此舉對於保存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起很大作用，應給予充分肯定。

正因為政府及學界有此共識，抗戰中中國大學的整體水準沒有下降，很多專業領域甚至有明顯的提升。如西南聯大，各院系都有很好的教授及研究成果。⁵¹這裡不準備仔細清理教授們「學術參戰」的決心與能力，⁵²只想從「心態史」角度，談論教授們著述時的心情——南渡的悲憤，北歸的願望，艱難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如何滲透到具體的著述中去。

在 1946 年刊行的《聯大八年》中，有費孝通教授的《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其中提及自己的寫作：「跑警報已經成了日常的課程。經驗豐富之後，很能從容應對。……我在這些日子，把翻譯《人文類型》排成早課。因為翻譯不需要有系統的思索，斷續隨意，很適合於警報頻煩時期的工作。」⁵³至於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在躲避空襲的間隙，陸續寫成日後成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書的原稿是英文，據

⁵⁰ 聞一多 Wen Yiduo：〈八年的回憶與感想〉“Banian de huiyi yu ganxiang”，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聯大八年》*Lianda banian*（昆明[Kunming]：西南聯大學生出版社[Xinliananda xuesheng chubanshe]，1946年），頁4-5。

⁵¹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Guoli xinan lianhexue xiaoshi* 第二編「院系史」，頁104-434；易社強 John Isrnel 著、饒佳榮 Rao Jiarong 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Zhanzheng yu gemingzhong de xinanlianda* 第三部分「諄諄教誨，濟濟良師」，頁161-277。

⁵² 聞黎明 Wen Liming：《抗日戰爭與中國知識份子》*Kangr izhanzheng yu zhongguozhishifenzi* 第六章「學術參戰」，作者分「弘揚愛國主義」、「加強應用科學」和「推動國防科技研究」三節，主要強調聯大教授的研究工作與抗戰的關聯性。

⁵³ 費孝通 Fei Xiaotong：〈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Shusan——jiaoshou shenghuo zhi yizhang”，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聯大八年》*Lianda banian*，頁55。另，〔英〕弗思（Firth Raymond）著、費孝通譯 Fei Xiaotong：《人文類型》*Renwen leixing*（重慶[Chongq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1944年）。

說是因為防空洞裡既無桌椅，又無燈光，用英文寫作，「可以閉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畫下去」。⁵⁴

作為後來者，我們往往只看見著述，而未能真切體會前輩那「壓在紙背的心情」。馮友蘭曾提及聯大教授為何埋頭著述：

從表面上看，我們好像是不顧國難，躲入了「象牙之塔」。
其實我們都是懷著滿腔悲憤無處發洩。那個悲憤是我們那樣做的動力。金先生的書名為《論道》，有人問他為什麼要用這個陳舊的名字。金先生說，要使它有中國味。那時我們想，哪怕只是一點中國味，也是對抗戰有利的。⁵⁵

至於謙謙君子湯用彤的講課，同樣蘊涵著時代的憂憤：「湯先生也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內心隱藏著對專制腐敗統治的極度不滿，但卻與感時憂世低徊吟詠的詩人不同，有哲人的氣質，寓悲憤於超逸之中。這一點，在講授魏晉玄學一課中不時流露出來。對於魏晉的哲學思想體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賞僧肇。但對當時社會的實際影響，他卻強調阮籍、嵇康，指出他們才是魏晉名士風流的代表人物。」⁵⁶關於聯大師生為何格外關注中古時代的思想及文章，我曾有過如此表述：「南渡的感時傷世、魏晉的流風餘韻，配上嵇阮的師心使氣，很容易使得感慨遙深的學子們選擇『玄學與清談』。40年代之所以出現不少關於魏晉南北朝的優秀著述，當與此『天時』『地利』不無關聯。」⁵⁷可以這麼說，所學專業有別，可那個時代的聯大師生，全都是「有情懷的」。

世人談及聲名顯赫的西南聯大，喜歡從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位校長（常委）入手。其實，三人中長期在昆明的只有梅貽琦，而梅發

⁵⁴ 劉紹唐 Liu Shaotang：〈《西潮》與《新潮》〉“Xichao yu xinzhao”，《傳記文學》*Chuanjiwenxue* 11 卷 2 期，1967 年 8 月。

⁵⁵ 馮友蘭 Feng Youlan：〈懷念金岳霖先生〉“Huainian Jin Yuelin xiansheng”，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情彌切》*Jiachuixiansong qingmiqie*，頁 69-70。

⁵⁶ 鄧艾民 Deng Aimin：〈湯用彤先生散憶〉“Tang Yongtong xiansheng sanyi”，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情彌切》*Jiachuixiansong qingmiqie*，頁 74。

⁵⁷ 陳平原 Chen Pingyuan：〈念王瑤先生〉“Nian Wang Yao xiansheng” 第三節「中古文學研究的魅力」，見《當年遊俠人——現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Dangnianyouxiaren——xiandai zhongguo de wenren yu xuezhe*（北京[Beijing]：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2006 年），頁 242-246。

揮的作用也沒有想像的那麼大。閱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合編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印象最深的是教授會的權力與決策之果斷。三校聯合，取北大的相容並包（學術自由）、清華的教授治校（嚴格要求）以及南開的應用實幹（堅韌不拔），合成一種新的聯大校風。而在制度建設方面，清華貢獻最大。西南聯大決策和管理之相對民主，與梅貽琦長期主持常委會工作以及教授會制度的確立不無關係。西南聯大的教授會，比起清華時期來，權限有所縮減，基本上屬於諮詢機構；但在處理突發事件的關鍵時刻，教授會挺身而出，支持學生爭取民主運動，作用非同小可。⁵⁸世人之所以喜歡從三位校長說起，除了這樣「講故事」線索簡單，效果很好，我懷疑還有「官本位」的潛在影響。查閱大量檔案公文、書信日記、回憶錄，以及散文小說等，逐漸展開五彩繽紛的歷史場景，你會發現，戰爭中西南聯大之所以波瀾不驚、弦歌不輟，教授起關鍵性作用。

所謂「教授治校」，乃基於對學術共同體的信任。西南聯大教授大都是留學生（尤其是理工科方面），有基本相同的學術理念，故能真誠合作。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的《聯大八年》（1946），其「聯大教授」部分有一類似「小引」的插頁，稱：

聯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當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歐陸，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學。三位常委：兩位留美，一位未留學。五位院長，全為美國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及兩位留歐陸，三位留英外，皆為留美。⁵⁹

一所大學的教授，留學生占 86%（留美學生占 55%），這種學術背景的高度同質，在那個特定時代，使得教授們容易就某些重大問題達成共識，減少不必要的內部紛爭。而環境的艱難，使得文、理科教授混合居住，彼此之間很容易溝通。

⁵⁸ 陳平原 Chen Pingyuan〈過去的大學〉“Guoqu de daxue”，《新民晚報》Xinmin wanbao，2000年7月16日。

⁵⁹ 〈聯大教授小引〉“Lianda jiaoshou xiaoyin”，見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聯大八年》Lianda banian，頁160與161之間的插頁。

比起教授之合作無間，更重要的是師生關係十分融洽。聯大西遷昆明後，1938年春曾在蒙自設文法學院，負責籌備的鄭天挺教授日後回憶：「西南聯大的八年，最可貴的是友愛和團結。教師之間、師生之間、三校之間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開端。同學初到蒙自時，我每次都親到車站迎接，悉心照料，協助幫運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⁶⁰我曾引用馮友蘭1948年撰寫的《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談及那個時期「中國的大學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現。」關鍵在於：「教授學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嚴肅，又快活。」⁶¹把這段話略為引申——放長視野，九年聯大，最讓後來者懷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的師生「打成一片」，一起經歷苦難，一起探索學問，因而，「又嚴肅，又快活。」這一狀態，在我看來，既學術，也精神，乃大學之為大學的理想境界。⁶²

這種師生親密無間，除了中國書院傳統，某種程度上也是戰時經濟困難以及生活空間縮小造成的。著名史學家、當年聯大歷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當時『聯大人』的日常活動半徑不會超過25或30分鐘的步行，生活空間如此急劇的緊縮是造成聯大高度『我群』意識的有力因素。」「從1941和1942年起，持續的惡性通貨膨脹，逐漸使一貫為民主自由奮鬥的聯大，變成一個幾乎沒有『身份架子』，相當『平等』、風雨同舟、互相關懷的高知社群。」⁶³而著名數理邏輯學家、當年聯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憶文章中稱：「教師與學生相處，親如朋友，有時師生一起學習新材料。同學之間的競爭一般也光明正大，不傷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討論，以增進對所學知識的

⁶⁰ 鄭天挺 Zheng Tianting：〈滇行記〉“Dian xing ji”，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da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情彌切》*Jiachu xiansong qingmiqie*，頁331。

⁶¹ 馮友蘭 Feng Youlan：〈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Huinian Zhu Peixian xiansheng yu Wen Yiduo xiansheng”，《文學雜誌》*Wenxue zazhi* 3卷5期，1948年

⁶² 陳平原 Chen Pingyuan：〈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Liuwei shichang han yisuo daxue——wosuo zhidao de xinanlianda”，《21世紀經濟報導》*21 Shiji jingjibaodao* 初刊，2007年11月12日，後收入陳平原 Chen Pingyuan：《大學有精神》*Daxue you jingshen*（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daxue chubanshe]，2009年）。

⁶³ 何炳棣 He Bingdi：《讀史閱世六十年》*Doushi yueshi liushinian*（桂林[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Guangxi shifandaxue chu banshee]，2005年），頁151-152。

瞭解。離開昆明後，我也交過一些別的朋友，但總感到大多不及聯大的一些老師和同學親近。」⁶⁴

事隔多年，追憶逝水年華，難免夾雜個人感情色彩。可對照當初的歷史資料，不難發現，聯大師生關係確實非同一般。《聯大八年》中，「聯大教授」的「小引」稱：「這裡收集到的關於教授報導的文字在我們是沒有什麼標準的。這中間差不多是每位同學描寫他熟識的先生」，至於那些只開列教授履歷，或者炫耀其官銜的，「我們也就只有從略」了。除了《聞一多先生死難經過》、《聞一多先生最後一次演講》、《聞一多先生事略》，接下來就是總共 33 頁篇幅的《教授介紹》。⁶⁵作者採用「剪影」手法，雖只聊聊數語，卻相當傳神。這裡引述若干則，以見當年學生眼中的著名教授：

哲學心理系主任湯用彤：「湯先生歲數並不太高，頭髮卻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來，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擔之下，湯先生遠在 1942 年就賣去了皮氈，家裡經常吃稀飯過活。然而對同學仍然教誨不倦，而且面色毫無憂容。講起書來毫不使人乏味。」（169 頁）

歷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書有條不紊，同學認為雷先生寫黑板都是有計劃的。雷先生的腦筋是超級冷靜的，只有在這次東北問題中是僅有例外，講得來老淚橫流。雷先生常為《中央日報》寫點星期論文，以彌補日常費用。」（170 頁）

歷史系教授劉崇鋈：「劉先生熱忱愛國，昆明有什麼關於政局的講演，是他常去聽的。前次知識青年從軍，劉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營。可是後來在歡迎從軍同學返昆席上，劉先生致詞，當他說到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時，眼淚不禁奪眶而去。」（170 頁）

⁶⁴ 王浩 Wanghao：〈誰也不怕誰的日子〉“Shei ye bupa shei de rizi”，《雲南文史資料選輯》Yunnan wenshiziliao xuanji（昆明[Kunming]：雲南人民出版社[Yunnanrenmin chubanshe]，1988 年）第 34 輯「西南聯合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66。

⁶⁵ 〈教授介紹〉“Jiaoshou jieshao”，載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聯大八年》Lianda banian，頁 169-201；以下引文，隨文注明頁數。

化學系主任曾昭掄喜歡寫時評，且從事民主運動：「他很能和同學接近，同學舉辦的各種活動，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請，這一點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貫徹始終』的跟同學一道吃，玩，鬧。……曾先生不修邊幅，有時一隻腳穿襪，另外一隻卻沒有。衣服的扭（紐）扣老是不齊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腳上。有一次，曾師母俞大綱先生到昆明來了，曾先生同曾師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174 頁）

政治學系主任張奚若：「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學者，想來是大家所熟知的了。遠在三十二年冬，張先生就指出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主席個人獨裁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張先生對同學非常親近和藹，你可以一直坐在張先生家裡談上三四個鐘頭。張先生是胡適先生的好朋友，遠在『一二·九』時候，他曾經以〈晉察不應以特殊自居〉為題而使《獨立評論》封閉。」（175 頁）

物理學教授王竹溪：「據我粗粗的觀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虛心而又興趣寬廣的一位，譬如三十三年姜立夫先生開高等幾何一課時，王先生幾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細心諦聽；而且還勇於發問，頗有西洋人的作風。此外王先生對中國文字很有興趣，為了中國辭書的部首太多翻閱不便，王先生正在編訂一部部首非常簡單的字典。去年時見他在唐蘭先生的《說文解字》課上旁聽，大概就是為的這個罷。」（178 頁）

教務長、社會系主任潘光旦：「潘先生是社會學家同時是優生學家，常在優生學班上談起自己站在國民的立場也算盡了一己之責，因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在歡送畢業同學會上常勸大家努力解決婚姻問題……潘先生自己承認有演講癮，的確潘先生的口才是少有的，演講起來，如黃河長江滔滔不絕，而所講的又是層次清楚有條不紊。」（178-179 頁）

文學院長馮友蘭：「根據馮先生最近幾年的行動，有很多人以為馮先生由『風流』而轉變為『現實』，由『為無為』而

轉變到『有有為』了。假若太虛是『政治和尚』，那麼馮先生可以稱為『政治哲學家』了。」(185 頁)

算學系主任楊武之：「為人忠厚老誠，對同學異常和善。上課的時候，頗愛講一點共產黨教人放火的大道理」(185 頁)

社會系教授費孝通：「跟同學關係很合得來，打球開會常跟同學們在一道。……費先生寫的論文有散文小說的筆調，看起來毫不使人厭倦」。(186 頁)

因為是小品文字，對於這 102 位教授的介紹，不太涉及各自的專門學問，關注點有三：一是演講口才，二是對待同學的態度，三為介入社會的熱情。尤其是談及中文系教授，更是格外看重講課效果。羅庸：「他尊崇儒家，口才很好」(177 頁)；聞一多：「他的課最叫座，沒有一門課不擠擁」(177 頁)；唐蘭：「唐先生的課以前很叫座，現在卻不行了」(181 頁)；羅常培：「一口流利北平話，聽起來稍使人感覺有點『油滑』」(181 頁)。這種三言兩語的「評點」，有很大的隨意性，不能當「學術鑒定」看待；但從行文風格可以看出，作者未取「高山仰止」的視角，甚至還略帶調侃。如此相濡以沫、平等相待的師生關係，此前此後都難得一見。

四、以本科教學為中心

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從事學術研究，照樣有很好的業績。尤其是人文學，不僅未受缺少實驗設備的影響，甚至更因戰火而激發了學者的潛能與情懷。謝幼偉在〈抗戰七年來之哲學〉中稱：「在烽火滿天，四郊多壘之際來談哲學，這是中國哲人的常事，也是中國哲人的本色。」嚴酷的戰爭環境，並沒有阻礙中國哲學的進展。「實際上，這七年來的中國哲學，比起中國任何一時期來講，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的說，中國哲學是進步了。這七年來的抗戰，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新生。」⁶⁶謝幼偉列舉這一時期重要的哲學研究成

⁶⁶ 謝幼偉 Xie Youwei：〈抗戰七年來之哲學〉“Kangzhan qinianlai zhi zhexue”，初刊《文化先鋒》*Wenhua xianfeng* 3 卷 24 期，收入賀麟 He Lin：《當代中國哲學》*Dangdai zhongguo zhexue*（南京[Nanjing]：勝利出版公司[Shengli chubangongsi]，1945 年）作為附錄，頁 143-155，此處引文見賀著頁 143。

果，如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賀麟《近代唯心論簡釋》、章士釗《邏輯指要》、馮友蘭《新理學》、金嶽霖《論道》，還有沈有鼎在《哲學評論》上發表的「意指分析」的兩章。由此可見，「這七年的抗戰，並沒有阻礙中國哲人的思索，反而，使他們的思索更為敏銳了」⁶⁷。哲學研究如此，史學、文學、語言、宗教等領域，何嘗不是這樣。若聯大教授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錢穆的《國史大綱》、雷海宗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戰爭沒有完全阻隔學術，反而激起中國學術的強大生命力，這點很讓人欣慰。

不同專業的學者，受戰爭影響深淺不一。講課沒問題，若需要精密儀器配合的，則不免捉襟見肘。聯大物理學系教授吳大猷在回憶錄中談及其如何請北大校方在崗頭村租了一所泥牆泥地的房子做實驗室，找一位助教把三稜鏡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湊成一個最原始的分光儀，試著做一些拉曼效應工作。「我想，在 20 世紀，在任何實驗室，不會找到一個僅靠一個三稜鏡，並且是用一個簡陋木架做成的分光儀。」⁶⁸靠如此簡略的儀器做實驗，寫論文，實在太難為教授們了。

這裡涉及對西南聯大學術水準及發展方向的基本判斷。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談及：「總之，聯大理工方面，尤以數理，最能發揚光大戰前三校優良學風。我對年來和科學界老朋友憶往的積累印象是：當年聯大在數理知識的傳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進水準了。」⁶⁹最能說明這一點的，莫過於聯大學生楊振寧、李政道赴美深造，日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而截止《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出版的 1996 年，聯大教師中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有 69 人，學生中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有 80 人，合計 149 人。⁷⁰單憑這些數字，人們也有理由對西南聯大的學術水準充滿信心。更何況，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信誓旦旦地說：「想起在中國的大學生活，對西南聯大的

⁶⁷ 謝幼偉 Xie Youwei：〈抗戰七年來之哲學〉“Kangzhan qinianlai zhi zhexue”，見賀麟 He Lin：《當代中國哲學》*Dangdai zhongguo zhe xue*，頁 155。

⁶⁸ 吳大猷 Wu Dayou：《回憶》*Huiyi*（北京[Beijing]：中國友誼出版公司[Zhongguo youyi chubhan gongsi]，1984 年），頁 34。

⁶⁹ 何炳棣 He Bingdi：《讀史閱世六十年》*Doushi yueshi liushinian*，頁 158。

⁷⁰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da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Guoli xinan lianhedaxue xiaoshi*，頁 3。

良好學習空氣的回憶總使我感動不已。聯大的生活為我提供了學習和成長的機會。」⁷¹

毫無疑問，西南聯大是當年中國最好的大學。三校合一，師資力量強，學術水準高，「兩彈一星」元勳朱光亞當年就慕名從中央大學轉學西南聯大。聯大算學系教授陳省身對自己所處的學術環境也相當滿意：「三校聯合，教員不缺，所以我有機會開高深的課，如：李群、圓球幾何學、外微分工程等。」⁷²可晚年接受採訪，陳省身是這樣談論聯大的學術水準的：「西南聯大也就是說，大家都是矮子的時候它比較高一點，沒什麼了不得。」⁷³單看胡適從美國寄《拓樸學》給江澤涵教授，聯大算學系老師於是分頭手抄，然後開展研究；或者聯大為圖書借閱制訂十分嚴苛的制度，以免學生們無書可讀，你就不難明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年聯大許多領域的學術水準，其實並不像今人所渲染的那樣高超。

生活艱難，實驗設備很差，聯大教授的研究（人文學不在此列）大受限制。可也正因此，教授們把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學生上。這一點，單看聯大的研究生教育，就很容易明白。西南聯大的研究生由三校分別招收與管理，學籍不屬於聯大，故統計起來有點麻煩。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研究所方面，清華畢業了 32 人，北大畢業了 19 人，南開畢業了 24 人⁷⁴。而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第三卷中的《清華研究院歷屆畢業生論文題目一覽》（1940 年-1946 年），確實是 32 人；至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歷屆研究生論文題目一覽》（1939 年-1945 年），名單上則有 35 人（即便扣除沒有論文題目的 5 人，也是 30 人）⁷⁵。記載雖略有出入，但聯大因經費限制，招收研究生數量不多，九年間正式畢業的不到百名，則是千真萬確。比起今日中國大學，一個院系每年畢業的博士碩士都不止此數，實在讓人驚歎。

⁷¹ 楊振寧 Yang Zhenning：〈超晶格之後記〉“Chaojingge zhi houji”，1945 年，《讀書教學四十年》*Doushu jiaoxue sishinian*（香港[Xianggang]：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1985 年），頁 5。

⁷² 陳省身 Chen Shengjuan：〈我在聯大的六年〉“Wozai lianda de liunian”，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情彌切》*Jiachuixiansong qingmiqie*，頁 190。

⁷³ 張曼菱 Zhang Manling：《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Xinan lianda renwu fangtanlu*，頁 35。

⁷⁴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Guoli xinan lianhexue xiaoshi*，頁 39-41；頁 663-668。

⁷⁵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Guoli xinan lianhexue xiaoshiziliao* 第三卷，頁 469-475。

因主客觀各方面原因，沒有能力擴大研究生教育的西南聯大，選擇以本科教學為中心，這是明智之舉。原本是缺憾，可揚長避短，反而成就了西南聯大的名聲——因為，本科教學乃大學之本，除了具體的專業傳授，還有精神氣度的薰陶，影響更為深遠。而本科生對母校的認同感，又遠在博士生之上。這就難怪，半個多世紀後的西南聯大，被年邁的校友們越說越好，越說越偉大。

楊振寧之表彰西南聯大，也主要集中在本科教學，尤其是學生的基礎知識如何扎實：「西南聯大的教學風氣是非常認真的。我們那時候所念的課，一般老師準備得很好，學生習題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學的四年和後來兩年研究院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⁷⁶多年後接受採訪，楊振寧說得更明確：「當時，西南聯大老師中有學問的人很多，而同時他們對於教書的態度非常認真。……（不只是聯大，浙大也好，中央大學也好，華西大學也好）這些學校的教師對於教學的認真的態度都很好，比起美國今天的最好的大學的老師教本科生的態度，平均講起來好。這個結果是一個好的學生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學到很盜實的知識、學到很深入的知識、學到很廣的知識。」⁷⁷

1945 年秋，吳大猷建議選派物理、化學、數學人員出國考察或深造，被當局採納。西南聯大選送到著名物理學家費米門下念書的，是已念完研究生的楊振寧和大學二年級學生李政道。李的回憶與楊的文章同調：「在抗戰的時候，就是老師對學生培養的經驗是很高度的……他們看見有一個優秀的學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養的。」⁷⁸最能說明教授識才、愛才且傾盡全力培育的，恰好是李政道本人的故事。這點，在吳大猷的《回憶》中，有很動人的描述⁷⁹。為了說明吳大猷晚年的回憶並非自誇，引錄一段《聯大八年》中的文字：

假定說聯大物理系教授都比較瘦的話，那末吳先生無疑是個例外。當他穿著一件較小的長袍來上課時，那件長袍簡直就是鼓足了氣的氣袋。他講課的特點是說得快，寫得快，擦得快，心手遲鈍者，實在頗有望洋興嘆之感。下課鐘響了，吳

⁷⁶ 楊振寧 Yang Zhenning：《讀書教學四十年》*Doushu jiaoxue sishinian*，頁 114。

⁷⁷ 張曼菱 Zhang Manling：《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Xinan lianda renwu fangtanlu*，頁 43。

⁷⁸ 張曼菱 Zhang Manling：《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Xinan lianda renwu fangtanlu*，頁 62。

⁷⁹ 吳大猷 Wu Dayou：《回憶》*Huiyi*，頁 40；頁 41-42。

先生總是繼續守住崗位，孜孜不休，每每延遲到下一堂鐘聲響了為止。吳先生據說是物理系最淵博的一位，正因為如此他即將與華羅庚先生遠渡重洋一探原子彈的秘密。他是北大教授，在聯大曾開過的課程有電磁學，近代物理，理論物理，量子力學等。⁸⁰

受作家筆墨的影響，很多人誤以為，西南聯大的理科教學很認真，文科則很隨意。汪曾祺〈西南聯大中文系〉稱：「中文系似乎比別的系更自由。工學院的機械製圖總要按期交卷，並且要嚴格評分的；理學院要做實驗，資料不能馬虎。中文系就沒有這一套。……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劉文典先生講了一年莊子，我只記住開頭一句：『《莊子》嘿，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他講課時東拉西扯，有時扯到和莊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罵人的話，留給我的印象頗深。」⁸¹與此相呼應的，是何兆武的《上學記》。在「自由，學術之生命」節，何也談及聯大教師講課之絕對自由。⁸²文科教授本來就是個性強、逸事多，加上回憶文章多挑好玩的講，後世讀者容易被誤導，以為聯大生活全都是《世說新語》般的文人趣味。

聯大教授講課確實很自由，但我認同校史編者的說法：「聯大對基礎課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⁸³李凌在追懷聯大中文系副教授余冠英時，有這麼一段話：

有意思的是，有的教授在北平時有點所謂名士派頭，如懶得看卷子，憑印象打分數等，到昆明後，艱苦環境卻把這點「名士派頭」磨掉了。學校對教授的要求也是嚴格的，對其言行有損為人師表形象的教師，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教授的教學都很認真，所有教授不管多麼有名氣都親自給本科生

⁸⁰ 〈聯大教授〉“Lianda jiaoshou”，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聯大八年》*Lianda banian*，頁 178。

⁸¹ 汪曾祺 Wang Cengqi：〈西南聯大中文系〉“Xinanlianda zhongwenxi”，《精神的魅力》*Jingshen de meili*（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daxue chubanshe]，1988 年），頁 77-79。

⁸² 何兆武 He Zhaowu：《上學記》*Shangxueji*（北京[Beijing]：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2006 年），頁 107-113。

⁸³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xda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Guoli xinan lianhexdaxue xiao shi*，頁 70。

講課。可以說，沒有一個不上課的教授，許多名教授還親自給大一的新生上基礎課。有的課程由於比較冷僻，或因其他原因，選修的學生很少，但即使只有一個學生，教師也非常認真地教課。⁸⁴

可與這段回憶文字互證的，是 1942 年暑假後朱自清講授「文辭研究」這門課程。據季鎮淮稱：「聽課學生只有二人，一個是王瑤，原清華中文系的復學生；另一個是我，清華研究生。沒有課本，上課時，朱先生拿著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條一條地抄材料，抄過了再講，講過了又抄，一絲不苟，好像對著許多學生講課一樣。王瑤坐在前面，照抄筆記；我坐在後面，沒抄筆記。」⁸⁵

與今日中國大學拼命發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聯大真正得意之處在本科教學。這些受過良好訓練，深受聯大精神薰陶的本科生，日後因緣際會，或出國繼續深造，或在實踐中自己探索，逐漸成為一代名家——這或許是西南聯大留給我們的最為深刻的教誨。

五、「人和」的另一面

抗戰中各大學內遷的路線，並不是事先規劃好的，都是隨機應變。迴避戰火之外，還得考慮遷入地的交通、物產、民情、文化傳統、政治氛圍等。大學與地方之關係，有的順風順水，有的磕磕碰碰，這些都嚴重制約辦學的效果，更影響日後校友們的追憶。長沙臨時大學之所以西遷昆明，主要看中的是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昆明地處西南邊陲，距抗日戰爭前線較遠，可以有比較穩定的學習環境；有滇越鐵路、滇緬公路可通國外，圖書儀器進口比較方便，可以較便利地瞭解國際學術和科研發展的動態。」⁸⁶此外，雲南省主席龍雲與蔣介石的矛盾，也是常被提及的因素。當年的昆明，意識形態上不太受中央政府控制，只要不直接

⁸⁴ 李凌 Li Ling：〈余冠英老師回憶聯大〉“Yu Guanying laoshi huiyi lianda”，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da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情彌切》*Jiachuixiansong qingmiqie*，頁 32。

⁸⁵ 季鎮淮 Ji Zhenhuai：〈紀念佩弦師逝世三十周年〉“Jinian Peixian shi shishi sanshizhounian”，《來之文錄》*Laizhi wenlu*（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shixue chubanshe]，1992 年），頁 433。

⁸⁶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da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Guoli xinan lianhedaxue xiaoshi*，頁 96。

反龍雲，師生們的思想表達是比較自由的（包括遊行、貼標語等）。因此，談論西南聯大的成功，必須把雲南的因素考慮在內。

為了論述思路的完整，除了指出昆明在戰時優越的地理環境，還得兼及「天時」與「人和」。就先從昆明的氣候說起。宗璞的長篇小說《東藏記》是這樣開篇的：

昆明的天，非常非常的藍。……藍得豐富，藍得慷慨，藍得澄澈而光亮，藍得讓人每抬頭看一眼，都要驚呼，哦！有這樣藍的天！

奇妙藍天下面的雲南高原，位於雲貴高原的西部，海拔兩千左右。高原上有大大小小的壩子一千多個。這種壩子四周環山，中部低平，土層厚，水源好，適合居住。昆明壩可謂眾壩之首。昆明市從元代便成為雲南首府。在美麗的自然環境中，出了些文武人才。一九三八年一批俊彥之士陸續來到昆明，和雲南人一起度過了一段艱難而又振奮的日子。⁸⁷

作為西元 1938 年來到昆明的「俊彥之士」蔣夢麟，日後撰寫《西潮》，第三十一章「戰時之昆明」，有對昆明氣候的詳細描寫：

昆明四季如春，夏季多雨，陣雨剛好沖散夏日的炎暑。其他季節多半有溫煦的陽光照耀著農作密茂的田野。

在這樣的氣候之下，自然是花卉遍地，瓜果滿園。甜瓜、茄子和香櫟都大得出奇。老百姓不必怎麼辛勤工作，就可以謀生糊口；因此他們的生活非常悠閒自得。初從沿海省份來的人，常常會為當地居民慢吞吞的樣子而生氣。但是這些生客不久之後也就被悠閒的風俗同化了。⁸⁸

這一四季如春的氣候，給聯大師生的日常生活帶來很大方便⁸⁹。至於雲南人基於此氣候而形成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更是給聯大師生留下了

⁸⁷ 宗璞 Zong Pu:《東藏記》*Dongcangji* (北京[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zue chubanshe], 2001 年), 頁 1-2。

⁸⁸ 蔣夢麟 Jiang Menglin:《西潮》*Xichao* (臺北[Taipei]: 世界書局[Shijie shuju], 1962 年初版), 頁 173。

⁸⁹ 何炳棣自稱「特別受到春城氣候的『恩惠』」，因患了可怕的斑疹傷寒，「據醫生說，

深刻印象。幾十年後接受採訪，任繼愈稱「我很喜歡雲南的民風，人民的風情非常的樸實」；費孝通則表彰雲南是多民族的地區，豐富多彩，「性格像山茶花一樣的美」⁹⁰。

不僅聯大師生，所有內遷大學的師生，多年後都會對當地表達感激之情。如著名遺傳學家、原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談家楨在《難忘的歲月》中稱：「可以這樣說，我一生在科學研究上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論文是在湄潭寫成的；我引以自豪的是在日後科學和教學中成績斐然，獨樹一幟的第一代學生，也是在湄潭培養的。我們是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江水，是勤勞淳樸的湄潭人哺育了我們。深情厚意，終生難忘。」⁹¹此乃多年後的追憶，加上是應邀撰文，難免多說好話。不妨回到當年語境，看看內遷大學是如何看待自己與當地民眾的關係。

就以曾駐足雲南澄江的中山大學為例。澄江距離昆明 56 公里，是個古老的小山城。中大師生員工二千餘人，分散在城內城外，借用祠堂和廟宇上課。一年半後，中大奉命遷往粵北坪石，臨行前，代校長許崇清發表《告別澄江民眾書》：「回憶年餘以前，本校員工，初客他鄉。生活習慣，不無互異，幸賴各民眾之熱情推愛，庇蔭有加，使千里遊子，於故鄉淪陷之後，倉皇遷徙之秋，不致托足無方，尚能安居研讀，幸何如之！」⁹²接下來，當然是開列中大為澄江人民做出的貢獻。與校長的表彰不同，讀 1941 年學術新潮出版社刊行的《中大嚮導》（作者不詳）第四章「生活三部曲」，其中有「矛盾和苦悶的兩年：在澂江」，則只談中大給予澂江的積極影響：「大學給澂江人不少的教益，澂江人一方面學會了早起、衛生、守時、滅蠅、請西醫、飲滾水，他方面也學會了用旗袍、高跟、西裝、革履、吃大餐、嘗美味。更重要的，是他們也學會了打倒縣長的技術，他們冷眼的觀察，已經有了很好的經驗。他們

如果是在重慶等地得了此病，就會非常嚴重，只有在春城才能無藥自愈。」參見何炳棣 He Bingdi：《讀史閱世六十年》*Doushi yueshi liushinian*，頁 162-163。

⁹⁰ 張曼菱 Zhang Manling：《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Xinan lianda renwu fangtanlu*，頁 149；頁 109。

⁹¹ 談家楨 Tan Jiazhen：〈難忘的歲月〉“Nanwang de suiyue”，《浙江大學在遵義》*Zhejiangdaxue zai zunyi*，頁 171。

⁹² 此文原載 1940 年 8 月 13 日國立中山大學離激話別會刊行的〈驪歌〉“Lige”，見吳定宇 Wu Dingyu 主編《走進中大》*Zou jin zhongda*（成都[Chengdou]：四川人民出版社[Sichuan renmin chubanshe]，2000 年），頁 73。

由經濟到政治，由政治到文化，學會了新智能。徽江人的眼，從此張開了。」⁹³

內遷大學與本地民眾之間，有互惠與互助，不可避免的，也會有摩擦。單是感恩，或滿足於自我表揚，都不全面。中外學者中，易社強著《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設第四章「聯大與雲南人」，分析何以說「聯大選擇昆明，可算是英明之舉」⁹⁴；余斌著《西南聯大·昆明記憶（1）》⁹⁵，屬於專題性質的隨筆集，其中〈「被雲南人驅逐出境」的李長之〉、〈本地人與外省人〉、〈楚圖南論雲南人愛聽恭維及其他〉三篇，都涉及這個問題。

談論聯大的「人和」，必須兼及內外兩方面：聯大內部的精誠團結，聯大與雲南民眾之互相扶持。所有談及聯大歷史的，都對「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這一點讚不絕口⁹⁶。因為，性質相近的西北聯大，由北平大學、北平師大、北平工學院組成，設在陝西城固地區，一年後就散夥了。為何西南聯大能消除矛盾，精誠團結，這與三位校長以及眾多教授的「人際關係」有關。

曾兼任聯大總務長的歷史系教授鄭天挺，在追懷梅貽琦先生時，談及三校之關係：

1941年4月，清華大學在昆明拓東路聯大工學院舉行三十周年校慶，張伯苓校長自重慶告訴南開辦事處的黃子堅說，清華和南開是「通家之好」，得從豐的慶祝。於是黃子堅在會上大作「通家」的解釋，指出清華的梅校長是南開第一班的高材生。接著，馮友蘭上臺說，要是敘起「通家之好」來，北大和清華的通家關係也不落後，北大文學院長（指胡適）

⁹³ 作者不詳：〈中大嚮導〉“Zhongda xiangdao”，見黃仕忠 Huang Shizhong 編《老中大的故事》*Laozhongda de gushi*（南京[Nanjing]：江蘇文藝出版社[Jiangsu wenyi chubanshe]，1998年），頁87。

⁹⁴ 易社強 John Isrnel 著、饒佳榮 Rao Jiarong 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Zhanzheng yu gemingzhong de xinanlianda* 第四章「聯大與雲南人」，頁89-104。

⁹⁵ 余斌 Yu Bin：《西南聯大·昆明記憶》*Xinanlianda — kunming jiyi (1)*（昆明[Kunming]：雲南民族出版社[Yunnan minzu chubanshe]，2003年），頁27-49。

⁹⁶ 馮友蘭 Feng Youlan：〈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Guoli xinan lianhedaxue jinianbeiwén*，見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da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情彌切》*Jiachuixiansong qingmiqie*，頁2。

是清華人，我是清華文學院長，出身北大，此外還有其他很多人。兩人發言之後，會場異常活躍，紛紛舉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持的情形。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聯大的三校團結，遠遠超過了三校通家關係之上。⁹⁷

類似的意涵，胡適在聯大九周年紀念會上也曾提及⁹⁸。光是三位校長和陸相處還不夠，更重要的是，這三所大學戰前就聯繫密切，教授中多有自由轉換、互相兼課的，故合作起來沒有任何障礙。

其實，更應該關注的，是聯大師生與本地民眾的生活習慣及思想文化的衝突。小品文雜誌《宇宙風》上，曾這樣描寫昆明的街景：「這種同時表現著二個不同的世紀，尤其當一個紅唇燙髮高跟的女郎，與一剛由山上下來的半開化的獠族土人，用頭頂著他的商品，在一條路上進行的時候，這也是由於抗戰而形成的奇觀吧！」⁹⁹不過，很快地，昆明市民接納了現代男女交往方式，聯大學生的服飾也發生了變化。原刊 1939 年昆明版《戰時知識》1 卷 12 期的《西南聯大的學生生活》，是這樣描寫聯大學生的「衣著」的：「退了色的黃制服，黃制帽。天氣冷了，加一件黑色棉大衣，這至少是 80% 的學生們一年四季唯一的服裝。其次是藍布大褂；西裝就少了。」女的濃妝豔抹形色輕佻的，大家就呼為『妖』；男的服裝奇特逾越常規的，大家便稱做『怪』；妖妖怪怪者，不過三兩人耳！」¹⁰⁰

⁹⁷ 鄭天挺 Zheng Tianting：〈梅貽琦先生和西南聯大〉“Mei Yiqi xiansheng han xinanlianda”，西南聯大校友會 Xinanlianhedaxue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Jiachuixiansong zai chuncheng*——huiyi xinanlianda，頁 67-68。

⁹⁸ 〈梅貽琦、黃子堅、胡適在聯大校慶九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摘要〉“Mei Yiqi, Huang Zijian, Hu Shi zai liandaxueqing jiuzhou nian jinianhuishang de jianghua zhaiyao”，原載北平《益世報》*Yishi bao*，1946 年 11 月 2 日刊出，其中胡適談「九年來的合作，是最高興的一件事」：「說到三校是『通家』時，我在美曾為全美清華同學會總會長，現在還是南開的董事。戰前清華校長羅家倫是我的學生。現任北大文學院長湯用彤，理學院長饒毓泰都是南開之教授。江澤涵也是南開校友。清華教授朱自清是北大校友，諸如此類，舉不勝舉。」見西南聯大校友會 Xinan lianhedaxue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Jiachuixiansong zai chuncheng*——huiyi xinanlian，頁 514。

⁹⁹ 慕文俊 Mu Wenjun：〈聯大在今日〉“Lianda zai jinri”，《宇宙風》*Yuzhoufeng* 第 94、95 期合刊，1940 年 6 月。

¹⁰⁰ 何期明 He Qiming：〈西南聯大的學生生活〉“Xinan lianda de xuesheng shenghuo”，見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da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情彌

因歷史傳統及生存環境不同，外地人與本省人的文化衝突不可避免。1939年1月12日至23日，中央大學教授劉節從上海轉香港、河內到達昆明，十二日間，先後拜訪或會晤陳寅恪、徐森玉、吳文藻、聞宥、徐旭生、傅斯年、羅常培、姚崇吾、毛子水、浦江清、吳晗、羅庸、梁思成、張蔭麟、錢穆、陳夢家、吳宓、王力、李濟、梁思永、顧頡剛、董作賓等，這些都是聯大、雲大以及中央研究院學者（多為劉節讀清華國學院時的師友），在交流學問的同時，也涉及各自對雲南及昆明的印象。劉離開昆明當天的日記，某種程度折射出當時西遷學者的普遍看法：

余至雲南共十二日，於昆明一帶之天氣最為愛好，其近郊風景亦自成天趣。惟於此間習慣風俗及土人之秉性大不同情，昆明人不論士農工商，早起甚晏，早上十二時以前商店開門者不及二三。土人十之五六皆有煙癮。人民懶惰，而自視甚高，既無大智慧，又不願納善意，排外之性高於一切。如此人民，與外來優秀之士相處日久，當難逃優勝劣敗之原則也。¹⁰¹

幸虧這日記是半個多世紀後才發表，要是當初公開刊出，作者很可能像撰寫《昆明雜記》的李長之那樣被當地人圍攻，乃至「落荒而逃」。

批評雲南人及雲南文化，這話必須是本地人講才合適。雲南大學文史系教授楚圖南是雲南文山人，對雲南人自身局限性有清醒的認識，面對聯大進駐後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文化衝突，主張「批判底接受一切」。楚圖南稱：「我們只要看看來到雲南的學者名流，對於雲南的批評，總是冠冕堂皇的一套恭維，如雲南天時氣候如何，人民性質如何，社會秩序如何之類。照他說來，雲南真好象是天堂一樣了。我以為這若不是對雲南人的一種侮辱，也就是對雲南人的一種欺騙。」楚文強調對人的尊重和學術的寬容，大膽接受外來文化，以便「使雲南文化能夠加速度地度到一個新階段」¹⁰²。

切》*Jiachuixiansong qingmiqie*，頁368。

¹⁰¹ 劉節 Liu Jie：〈昆明十二日〉“Kunming shierri”，《萬象》*Wanxiang*，2007年第10期。

¹⁰² 楚圖南 Chu Tunan：〈雲南文化的新階段與對人的尊重和學術的寬容〉“Yunnan wenhua de xinjieduan yu duiren de zunzhong han xueshu de kuanrong”，此文初刊《動向》*Dongxiang* 創刊號，收入作者散文集《刁鬥集》*Diaodouji*（貴陽[Guiyang]：文通書局[Wentong shuju]，1943年），見《楚圖南文選》*Chutunan wenxuan*（北京[Beijing]：

作為雲南人，不能自欺欺人，要勇敢地面對挑戰；而作為外來者，必須真誠地承認雲南人民為西南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蔣夢麟在《西潮》中稱：「昆明人對於從沿海省份湧到的千萬難民感到相當頭痛。許多人帶了大筆錢來，而且揮霍無度，本地人都說物價就是這批人抬高的，昆明城內到處是從沿海來的摩登小姐和衣飾入時的仕女。」¹⁰³而鄭天挺的《滇行記》也有翔實的記載：「我們大隊師生來到蒙自，轟動了整個縣城，該地商人遂乘機提價。原來在長沙時，學生包飯每月僅 5 元 5 角，且午餐晚餐可三葷二素。及至蒙自，商人卻將學生包伙提至每月 9 元，且菜為一硬葷、二岔葷（肉加菜）、二素，教師包伙每月 12 元。是時雲南本地各局之三等辦事員，月薪不過 12 元（滇幣 120 元），而教職員一月之伙食費已與該地職員一月收入相等，這不僅增加師生負擔，也覺得愧對當地父老，於是初議未諧。」¹⁰⁴

沿海城市與內陸地區民風之所以不同，與歷史傳統有關，也與經濟發展水準有關。早起晚起、準時不準時，還有商店開門時間等，都與此有關。昆明所處的地理位置，使其開化較晚，文化傳統不太雄厚；但也正因為比較閉塞，民風平和，對讀書人相當尊重，西南聯大方能成為主導力量。換一個民風剽悍或商品意識強的地方，聯大所面對的困難將會大得多。引入大批外來人口，必定擠佔本地人的生存空間，無論是聯大人還是後世史家，不能居高臨下，只說聯大對於雲南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所作貢獻，而不提及雲南民眾的撫育與支持。

六、「應叫青史有專篇」

原聯大經濟學系主任陳岱孫為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作序，稱：「我們聯大師生是否常有這種遺憾：西南聯大只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聯大的實體已不復存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¹⁰⁵其實，正因為西南聯大早已結束，才更值得後人追懷。就好

中共黨史出版社[Zhonggong dang shi chubanshe]，1993 年），頁 627-628。

¹⁰³ 蔣夢麟 Jiang Menglin：《西潮》Xichao，頁 173。

¹⁰⁴ 鄭天挺 Zheng Tianting：〈滇行記〉“Dian xing ji”，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da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笳吹弦誦情彌切》Jiachuixiansong qingmiqie，頁 329。

¹⁰⁵ 陳岱孫 Chen Daisun：〈肯定歷史 放眼未來（代序）〉“Kending lishi fangyanweilai(dai xu)”，見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Xinan lianhedaxue Beijing xiaoyouhui 編：《笳吹

像清華國學院、無錫國專、延安魯藝、燕京大學，以及香港的新亞書院、新加坡的南洋大學，因為過早「凋謝」，所以格外淒美。倘若西南聯大不散，一直延續到今天，評價肯定沒有這麼高。再好的大學，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只有消失在歷史深處的西南聯大，冰清玉潔，白璧無瑕。我們都只記得其風姿綽約，熱心談論其如何「回眸一笑百媚生」，而很少追究其存在的缺憾。翻閱 1946 年聯大學生編印的《聯大八年》，你會看到很多刻毒的批評與抱怨；幾十年後，這些老學生若撰寫回憶錄，必定是滿口讚揚之聲。我曾認真翻閱北大歷年「紀念冊」，得出一個結論：凡在校生編的，大都是批評意見；凡老校友編的，大都是溫馨回憶¹⁰⁶。兩種感覺都是真實的，最好是對照閱讀，方能見其真面目與真性情。

當然，西南聯大有其特殊性，以南渡始，以北歸終，這個故事實在太完美了。早先是「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後來又「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詩」¹⁰⁷。借用宗璞的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起承轉合之間，有充分的戲劇性，但又未見抹不去的陰影。那些被迫關閉的大學，當事人壯志未酬，深感壓抑；而西南聯大則是以勝利者的姿態，主動解散，班師回朝，故壯志多而悲情少。

另外，西南聯大的歷史及精神遺產為三校師生所共有，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學。這樣，今天的北大人、清華人、南開人，無論如何吹捧西南聯大，都不會被世人譏諷。陳岱孫曾感歎：「我們有的時候是否有些把西南聯大的歷史神話化了？」¹⁰⁸答案是肯定的，以老校友的回憶

弦誦情彌切》*Jiachuixiansong qingmiqie*。

¹⁰⁶ 陳平原 Chen Pingyuan:〈作為話題的北京大學——老北大的故事之七〉“Zuowei huati de beijingdaxue——laobeida de gushi zhi qi”，《讀書》*Doushu*，1998 年 5 期。

¹⁰⁷ 1938 年 6 月，陳寅恪 Chen Yinke 撰《蒙自南湖》*Mengzi nanhu*：「景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升平。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笙歌雜醉醒。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1945 年 8 月 10 日，重慶國民政府中央電臺廣播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陳寅恪聞知勝利消息，悲喜交集，當即賦詩一首：「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詩。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Yiyou bayue shiyiri chenqi wen riben qijiang xi fu”）參見《陳寅恪集·詩集》*Chen Yinke ji · Shiji*（北京[Beijing]：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2001 年），頁 24；49。

¹⁰⁸ 陳岱孫 Chen Daisun:〈肯定歷史 放眼未來（代序）〉“Kending lishi fangyanweilai(dai xu)”。

為主導，加上當地政府的大力策應，必定偏於溢美。更何況，今人之談論西南聯大，某種程度上是將其作為一面鏡子，來觀照今天的中國大學。因此，不僅僅是懷舊，更重要的是反省——反省 21 世紀中國的「大學之道」，到底該往那兒走。在這個意義上，聯大校友發起的對於聯大歷史的搶救，既寄託了他（她）們的個人情懷，也日漸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

「西南聯大」之成為熱門話題，是最近這十幾年的事。最早描述聯大生活的書，當屬 1946 年西南聯大學生出版社刊印的《聯大八年》。¹⁰⁹此後的四十年，幾乎沒有什麼動靜；有一部長篇小說《未央歌》（鹿橋著），但也只是在臺灣及香港流行。一直到上世紀 80 年代，當年的聯大學生陸續退休，加上整個環境變化，西南聯大的歷史記憶方才逐漸發酵。1984 年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創辦《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簡訊》（至今已出 42 期），對於凝聚校友、組織活動起了很大作用。而以下圖書的刊行更是功不可沒：《學府紀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臺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 年）、西南聯大校友會編《筊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雲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校史編輯委員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刊印，1986 年）、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筊吹弦誦情彌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年）、政協四川省敘永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敘永縣文史資料選輯》第 13 輯《西南聯大在敘永》（1990 年）、蒙自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等編《西南聯大在蒙自》（雲南民族出版社，1994 年）、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至於北大、清華、南開以及雲南師大四校合編的六卷本《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對於研究者來說，更是不可多得的寶庫。

上世紀 80 年代出版的《筊吹弦誦在春城》和《筊吹弦誦情彌切》，加上為北大校慶九十周年而編撰的《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年），這三本書起碼讓我們明白，關於「大學敘事」，就體例而言，

¹⁰⁹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神州圖書公司曾影印此書，改名《抗戰中的西南聯合大學》*Kangzhanzhong de xinanlianhe daxue*。可惜該書印刷效果很差，若不對照原本，很多字句根本無法辨認。

可以是歷史，也可以是文學；就立場而言，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民間；就趣味而言，可以是開新，也可以是懷舊。而這對於引領 90 年代中國學者及讀者的「大學想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於是，大家開始換一種眼光來看西南聯大的歷史。聯大教授的自述（如蔣夢麟的《西潮》、馮友蘭的《三松堂自序》、錢穆的《師友雜憶》）、日記（如浦江清的《西行日記》、《朱自清日記》、《吳宓日記》），以及學生的追憶（如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許淵沖的《追憶似水年華》、何兆武的《上學記》），還有小說散文（如外文系學生吳訥孫〔筆名鹿橋〕的《未央歌》、中文系學生汪曾祺的〈泡茶館〉、〈跑警報〉、〈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西南聯大中文系〉等散文，以及聯大附中學生馮宗璞的長篇小說《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等，都陸續進入了世人的閱讀視野。而張曼菱總編導、總撰稿的《西南聯大啟示錄》（五個光碟加一冊小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年）、《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音像片附同名書，雲南教育出版社，2007 年）¹¹⁰，讓聯大故事的講述更為「聲情並茂」。至於研究著作，除了本文引述的，值得推薦的還有謝泳的《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年）、姚丹《西南聯大歷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王喜旺《學術與教育互動：西南聯大歷史時空中的觀照》（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年）。

先是老校友，後是教育史家，接下來變成一個全民參與的「歷史記憶」。聯大之所以能吸引大眾的關注，不僅僅是閃光的數字，更重要的是動人的故事。經過 40 年的遺忘，20 年的發掘，如今恰到好處，該是西南聯大「風光」了。大家都在追憶、憑弔那所充滿神奇色彩的「大學」，問題在於，從何入手最為合適。

1983 年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成立，聯大中文系教授王力作《緬懷西南聯合大學》：「盧溝變後始南遷，三校聯肩共八年。飲水曲肱成學業，蓋茅築室作經筵。熊熊火炬窮陰夜，耿耿銀河欲曙天。此是光輝史一頁，應叫青史有專篇。」¹¹¹毫無疑問，西南聯大肯定是「青史有專

¹¹⁰ 經過 7、8 年的採訪，張曼菱手頭保存有 100 多位元聯大人物的原始錄影資料，剪裁成 9 碟 DVD 光碟，收錄的訪談對象包括朱光亞、陳省身、楊振寧、李政道、彭佩雲、費孝通等 21 位人物。

¹¹¹ 王力 Wang Li：〈緬懷西南聯合大學〉（手跡）*Mianhuai xinan lianhedaxue*，《笳吹弦

篇」的，問題是在什麼「史」上——是政治史、教育史，還是思想史、學術史？

西南聯大的遺址在今天的雲南師範大學校園內。1982年，校方在聯大遺址建立了「一二一運動紀念館」，2004年又在此紀念館附設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館」。十多年前，我曾批評《北京大學校史》，稱大學史的寫法不該是「學生運動」加掛一點「教學與研究」，引起了很大爭議。¹¹²幾年前，我撰文分析「清華國學院」的崛起，直言這是一個移步變形的過程：「最近二十年，在清華，流行著三套話語，對應著三個故事系統：第一，作為革命話語的聞一多和朱自清的故事；第二，作為學科體制的『清華學派』；第三，作為學術精神的清華研究院。」¹¹³同樣道理，總有一天，我們會倒過來：應該是「校史館」附設「一二一運動紀念館」，這才順理成章。

西南聯大不是一所一般的大學，從教育史、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入手深入探究¹¹⁴，都能有精彩的發現。讀文學的常說，有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談論中國大學，自然也不例外。面對日漸被「神話」的西南聯大，我的態度頗為騎牆：既欣喜，又惶惑。沒錯，作為戰時中國的最高學府，西南聯大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取得如此業績，實在讓人振奮。可我擔心，一次次充滿激情與想像力的「述說」，是否會熨平無數「傷疤」與「皺痕」，將九年艱苦卓絕的「聯大」之路，化簡為一個個激動人心的勵志故事？但願這只是我多慮。

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Jiachuixiansong zai chuncheng*——*huiyi xinanlian* 卷首插頁。

¹¹² 參見陳平原 Chen Pingyuan：〈大學史的寫作及其他〉“Daxueshi de xiezuo ji jita”，《讀書》*Doushu*，2000年2期。

¹¹³ 參見陳平原 Chen Pingyuan：〈大師的意義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讀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院」〉“Dashi de yiyi yiji dizi de wei zhi jiedouzuowei shenhua de——‘qinghuaguoxueyuan’”，《現代中國》*Xiandai zhongguo* 第六輯，（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daxue chubanshe]），2005年12月。

¹¹⁴ 我同意易社強的說法：「之所以有必要從歷史學的角度研究聯大，是因為它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知識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佔據了至關重要的地位。」參見易社強 John Isrnel 著、饒佳榮 Rao Jiarong 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Zhanzheng yu gemingzhong de xinanlianda*，頁3。

附記：筆者曾就此題，在杭州「浙江人文大講堂」（2007年12月15日）、上海大學（2008年12月10日）、海南大學（2009年1月5日）、（臺灣）政治大學（2010年12月23日）、北京大學（2011年2月28日）做專題演講，現綜合五講而成文。2011年9月12-19日修訂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10月4日定稿。